解锁北大学者的书房：什么书、怎么摆

记录31位当代北大学者的书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①王诗宬和他的书柜。 ②范晔家中无处不是书房。 ③戴锦华在书房中。 ④罗新与他的三面书墙。 ⑤贾妍在书房中。

本文图片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供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雅讲习教授吴志攀，办公室曾在二层，里面层层叠叠堆满了书，以至于当时管后勤的副校长多次来查看，说是怕他把楼压塌了。

这个风格的书房，大概是有传承的。吴志攀的导师芮沐先生，住过蔚秀园，书房面积很小，除了书，只有一桌一椅。学生去找他，师母就搬出一把折叠椅，支起来让学生坐。政治学家赵宝煦也是吴志攀的老师，晚年搬到蓝旗营的大房子，有不小的书房，可里面除了他自己的座椅空着之外，其他座椅上也堆着书，客人来了，得搬开这些书，才有地方坐……

“我的老师们就这样，所以我也这样，而且比老师们还不讲究，这可不能都怪我。”吴志攀为自己辩解。在他作序的《坐拥书城：北大学者书房》，以及续作《第一等好事：北大学者书房》中，共收录了31位当代北大学者的书房。

书房能看出一个人的个性、习惯、格局等，他们选择什么样的书籍、怎么安放这些书籍，都在不经意间透露出很多信息。

书的计量单位普遍是“墙”

推开戴锦华书房的门，映入眼帘的是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一整面书墙，书架上摆放着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各种书籍。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笑着说：“我的书房是一个‘混沌’。”

经历过书籍匮乏的时代，戴锦华曾经“逢书必买”。所有空间都被书侵占了，她几乎无法从中找到想要查阅的书籍，着急用的时候只能再买一本，原来那本早已“云深不知处”。

戴锦华在“电影与现实”课程直播中曾说，自己把书当成食物，正如三餐是不可以一日不吃的，书也是不可以一日不读的。她认为，现在很多人家里的书房可能装饰性大于实用性，但她的书房仍然是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可以自由阅读、思考和工作的空间，“书房不是一种陈设、一种情调。我不会在书房里玩”。

经过20多年的涓滴以汇，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罗新的藏书，已经超过1万册。朗润园的书斋只是冰山一角，3面书墙环绕两张桌案，书架的每一格都叠着内外两层书。古代汉籍、内亚文献、中亚史书、突厥语词典，还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多为旅行纪实，透露出主人的专业和偏好。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贺桂梅的办公室，书架占据了整整一面墙，从《创业史》《红旗谱》到金庸小说，从《丁玲全集》《赵树理全集》到《后宫·甄嬛传》，勾勒出现当代文学的光谱。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有这样的一个情节，费尔南达“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关在书房里”。对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主任、《百年孤独》译者范晔来说，文学和阅读也是他的日常。

范晔家中没有独立的书房，但书籍几乎摆入每个房间，所以也可以说，范晔家中无处不是书房。书籍最集中的客厅，书架顶天立地，书籍铺满了3面墙，原木的颜色，让人想起拉丁美洲的草泽与旷野。

范晔被称为“拉美文学的头号迷弟”，西语美洲文学类书籍占据书架的半壁江山。他在书架中划出特定的区域，放置他翻译过的作家的相关书籍，科塔萨尔、马尔克斯、波拉尼奥、因凡特……有关马尔克斯的书籍一排放不下，拐了个弯。

给书组“CP”、全屋都是猫，书房是一种心境

戴锦华的书架上不仅有厚重的书，还有不少有趣的小摆件：朋友送的潮玩手办、学生折的大罐五角星和千纸鹤、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套娃、各种毛绒玩具……“我有一些很个人的爱好，比如我喜欢毛绒玩具，所以到处都有。”戴锦华说。

“有趣”和“好玩”，是范晔经常提及的词，这不仅是他遴选书籍、建构书房的理念，还是他生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喜欢动物，自称“猫科动物之友”，书架间的摆件是美洲豹、大食蚁兽等各类“珍禽异兽”。他还会精心装扮它们，比如给南浣熊戴上一顶毛线睡帽，让恐龙化石骑上自行车……

书房也是范晔的“玩具房”，他经常把书搬来搬去，如同孩子的积木，摆放和重组，遵循自己的独特设计。比如，有一些按照书脊色彩的搭配来摆放，还有一些是他给书籍组的“CP”——《捉猫故事集》和《如何屠龙》并列，因为两个词组好像能形成对照和反差；西方现代小说奠基之作《堂吉诃德》与欧洲文艺复兴先声《神曲》放在一起，“我想堂吉诃德和但丁，可能都不会有太大的意见”。

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长聘副教授贾妍的书房中，沙发上的抱枕、书架上的摆件、墙面上的拼图……俯拾皆是“猫”。连书房的名字“缪书房”，都源于猫在埃及语中的发音。多年前，还在历史系攻读埃及学的贾妍，与书中一只名叫“塔缪”的古埃及猫邂逅，“因为觉得很可爱，所以暗暗把这只‘名存实无’的猫安排进了自己的未来”。

贾妍笑称，艺术史是一个可以名正言顺“玩物丧志”的学科。她钟爱收集工艺品、小摆件。但她坚称，自己是读书人，而非广搜博采的藏书家。“人类进入文明史的初期，图像和文字的区隔并非那么泾渭分明，比如一尊镂刻铭文的雕像，很难断言究竟是文物还是文献。”

对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而言，拥有一间独立书房曾经是一个梦想，但现在，除了满满当当的通顶书架，电子书数目已经远远超过纸质书。他相信，书的概念肯定是要与时俱进的。

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长聘副教授苏祺，更是与团队打造了一个智能化数字图书馆，接连研发出了文献溯源分析平台、识典古籍阅读与整理平台，以及《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系统、《朱子年谱》可视化系统等。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林毅夫说，真正的书房在心中，是一种心境、一种求知的欲望，是胸中有丘壑；真正的书房并不局限于一方天地，而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可能是在路上，在飞机上，在火车里；甚至在开会，在听报告，在调查研究中。但心中始终保持着对事物、对现象、对社会的好奇，想去了解背后的道理”。

讨论诗歌、爱情与理想，他们是书房的“国王”

吴志攀说，书房好比为学者量身定做的“衣服”，他们穿着合身不合身、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学者，也就是书生，手无寸铁，无权无势，只有这几平方米的书房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就是这里的“国王”，怎么舒服就怎么来。

在动辄以“墙”为单位统计书籍数量的众多学者书房中，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王诗宬的书柜毫不起眼。书不多，大多是与数学相关的读物，尤其是拓扑学。但即便在专业书中，依然能隐约看出他的阅读兴趣——他喜欢读诗。书桌上放着一本《魏晋南北朝诗精选》，书架上的《唐诗别裁集》也傲然挤进左右的数学公式里。

1977年，24岁的王诗宬到北京探望哥哥，坐公交车前往颐和园时路过北京大学，跳下车来，进了校门。他当时想不明白一个数学命题——6个人中，如果没有其中3个人两两相识，则一定有3个人两两不相识。后来成为北大数学科学学院首任院长的姜伯驹面对这个贸然上门的陌生年轻人，鼓励他学数学，第二年，王诗宬考上了北大的硕士研究生。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在“低维流形”的课堂上，王诗宬在黑板上写了两句诗。他的学生没有感到奇怪，拓扑学和曹丕之间有什么关系不重要，反正王老师喜欢乐府诗。

53岁那年，罗新用15天时间，沿着元代辇路的路线，从北京的元大都走向内蒙古的元上都，完成了450公里的徒步。这段经历被他写成《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一书。他愿意采取一种回溯性的视角，立足于当下的经验逆流而上，“只有从现实、从当前的生活经验出发，我们才能靠近并辨认过去”。

贺桂梅很愿意去了解日常生活中那些活的文化，比如观察周围的人、观察社会心理，去看热播的电视剧、电影、网剧，“这在广义上也是一种阅读”。她呼吁“人文学的想象力”就是打开自己，将个人的问题、文学的问题，放到一个大的社会结构关系层面来讨论，重新激活文学的力量。

距离翻译《百年孤独》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永远留在了马孔多，但燕园的范晔还要继续追寻属于他的前方：以书房为原点，拓开无限广阔的西语世界。他把文学史课堂搬到石舫上，带着学生在春天的未名湖畔读诗。他告诉学生，讨论诗歌、爱情与理想的岁月，是青春中“一倍惜年华”的闪光时分。

王诗宬在一次北京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给毕业生们送上了“不内卷”的祝福：你们在人生鲜花盛开的年华，已经鲜花盛开了。

年轻人读写家史：在『精神阿勒泰』寻找自我确定性

青春时代，每个人都向往广阔的世界，但每个人也都起步于小小的家。

□ 王钟的

“每一次的到达和离别，都要越过天山山脉。”从小到大，吴天一被家人寄予的梦想都是“离开新疆”，中学毕业后，她先是考到远离故乡的厦门大学，体验了“闽南长久的湿热”，随后又踏上了到异国求学的旅程。然而，当前往英国的洲际航班途经乌鲁木齐上空，她还是忍不住长久地注视那片广袤的疆域，“好像离开新疆的渴求在消解”。

出门在外，吴天一最怕被人问起“你是哪里人？”作为“疆三代”，她对故土的认知十分“破碎”——认为自己既是新疆人，又是广西人、河北人、湖北人。辞职回疆生活后，她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记录家里长辈的故事，探索自己的真正归属。她用AI修复了外公的照片，还给外婆写了3万字的回忆录。她把这些家史故事发表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又吸引其他“疆三代”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记忆碎片。

青春时代，每个人都向往广阔的世界，但每个人也都起步于小小的家。今年春节，给自己的长辈和家族“写家史”，成为一些年轻人独特的过年方式。阅读这些家史笔记，不仅能感受到一代代人筚路蓝缕的接续奋斗，也能感受到年轻一代蓬勃的生命力、创造力。这些带有温度的文字，也促使阅读者脱离碎片化的网络叙事，沉下心来，思考自己与家的深情纽带，与自己所成长的土地的温柔关联。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言，“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句话虽起源于学术领域，却道出了一个普遍的人文现象：人们对时代的理解往往始于个体经验的梳理。没有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经历可以脱离时代，但缺乏对个体关怀的时代叙事同样显得空洞无光、苍白无力。

正是千差万别的家族际遇与经历，共同汇聚成属于时代的大历史。通过记录书写自己的家族，年轻一代不仅近距离观察到血脉相连的涓涓细流，也在远眺着时代力量汇聚的滚滚浪涛。正如吴天一在笔记中所言：“时代的雨落下，每个小家的故事在此生长。”

家史写作重塑人们对“家”的理解，也加深了家人之间，尤其是不同代际家族成员的理解与信任。有人打破了无形的屏障，促成几十年来父子之间的第一次深谈；也有人产生跨越时空的共情，努力让长辈的遗憾化为前行的动力。他们亲手挖掘尘封已久的家庭往事，为家人也为自己感到骄傲。不管经历多少次离别，家的港湾始终是支撑人们继续前行的底气。

通过阅读家史，年轻人也获得了家风的传承与家族优良传统的熏陶。在留学生宫采薇的童年记忆里，奶奶是一个“老土”的人，穿得土、不会用电脑、没听过最流行的音乐。直到奶奶去世后，她重读奶奶的自传小说，发现在那个女性受到压迫的年代，奶奶为了上学勇敢地抗争，才意识到自己当年“揣着潮流当优越”的无知，更深刻地领悟到“做人要有思想、有闯劲儿、更要有知识”的家族信条。在宫采薇眼中，奶奶就是“自己故事里的大女主”。

很多写作者的灵感来源，都来自有关个人生活与家族过往的记录。难免有人会质疑：“人的经历是有限的，万一把生活写完了怎么办？”对此，作家李娟的回答是：“我打开的明明是一条河，滔滔不绝，手忙脚乱也不能汲取其一二。”不少家史分享者也有同感：“外婆一辈子做的事太多太多了，怎么写也写不完。”

近年来，在一些网络知名学者的倡导下，“附近的消失”议题走红舆论场。所谓“附近的消失”，指的是城市没能让人收获足够的亲密和温暖，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缺乏对周边世界的叙述愿望或能力。其实，“附近的消失”不仅因为基于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渠道，也因为传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淡忘。

对年轻一代而言，回顾自己家族的兴衰荣辱，又何尝不是与“附近”建立连接方式？打开一段家族史，就像来到“精神的阿勒泰”。在这些遥远而亲密的叙事里，表达着人们对爱的信念、对善的坚守，这也是人们对自我最大的确定性。

家，还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近段时间，不少海外用户涌入小红书，不少华人移民的后代一边分享家族历史，让读者窥见海外华人奋斗史的粗略样貌；一边试图通过网络寻找中国的家族痕迹，回望自己的“来时路”。“你祖父不是来自坎顿省，而是来自中国广东”，善良的中国网友看到他们的分享，帮助华人后代纠正因语言和文化隔阂产生的理解偏差，让这些散落世界各地的中华儿女更加精准地定位自己的根。这种跨越国界与身份的文明对话，再次让人体会到“地球村”的感动。

纪录片导演方励认为：“了解父母，了解家史，能让人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确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从传统文化的视角看，家是文明传承的基本纽带；从现代社会治理角度看，家又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单元。无论是只言片语，还是鸿篇巨制，这些家史都构成了历史的鲜活注脚，汇聚成浩浩荡荡的时代叙事。

了解过去，同样也是为了认清当下。分享家史的作者和读者，不仅在替自己打捞行将消逝的家族记忆，也替历史浇筑着人物群像，构建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坐标，让时代的河流更加清澈、未来的阳光更加明媚。

“每天都在把自己打碎重组”：与罕见病相处30年

2月28日是第18个国际罕见病日，中文主题为“不止罕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余冰玥**

31年，体重31千克，血钾1.3毫摩尔/升，70余次空肠营养管置入术，多关节习惯性脱位，心脏起搏器，输液港。

在《愿你可以自在张扬》一书的序言中，刘开心写下了这些关键词，作为描述自己的信息“锚点”，她把自己称为“一个‘潜伏’在健康人群体中的罕见病人”。

当一个罕见病人写一本书，很多人习惯性地以为它关于苦难、病痛，或是某种关于“如何战胜苦难”的励志传说。但刘开心不想这样，她想聊的不是疾病，而是艺术、爱与自由，还有生命。

刘开心患的是一种名为EDS的罕见病，全称是Ehlers-Danlos Syndrome（埃勒斯-当洛斯综合征），又称先天性结缔组织发育不全综合征。疾病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皮肤、韧带、血管和内部器官结缔组织脆性增加，比如关节松弛、消化道瘫痪、心肾功能异常、免疫系统异常等。

当罕见病落到刘开心身上，症状更为具象化：她无法消化人类的食物，对自己的汗液和眼泪过敏，热烈的拥抱可能导致关节脱臼。今年1月8日，她为自己签下了本年度第三张病危通知单。“很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弱小得惊人，又强大得可怕。”她在个人公众号里这样写道。

“弱小”是一种对疾病的客观写实。刘开心与罕见病EDS相处了30多年，“每天都在把自己打碎重组”。

由于疾病，幼年时她常常因为关节无法受力而摔伤，膝盖和手肘常见被红红紫紫的药水画着的各种图案。10岁之后，她的身高和体重再也没有增加。进食时要强忍痛楚，半夜无数次被疼痛叫醒，只能无助又困惑地在床上发呆。连哭泣也是要忍住的——眼泪会导致过敏，全身爬满密密麻麻的小红疹，奇痒难耐，还伴随阵阵灼热的刺痛。

长大后出国求学，由于全身多器官处于受累状态，刘开心经常因为严重心律失常而晕倒。因为消化道衰竭，吃任何食物都会导致消化道出血或肠梗阻，她已9年没有吃过常规食物。为了读完硕士，她从ICU转入过渡病区后，在病床上敲出了毕业论文。

“身体右边埋着输液港，左边植入了心脏起搏器，鼻子上插着直接入肠的鼻饲管。”刘开心在2023年接受央视采访时自嘲，“我是个‘修炼成精的接线板’，样子丑哭了”。

“强大”是在伤口上“画太阳”。书里收录了刘开心的诗歌随笔50篇、画作60余篇。“我就是很美的诗歌”“咽下了童年”“在爱之中，我得以遇见自己”……刘开心偏爱通过文字和画画的方式交流，这些诗歌、画作、随笔，编织出一个更多元、丰富、充盈的她：不只是罕见病患者，更是创作者，是和很多人一样热爱生活、努力活着的普通人。

许多人能从书里找到童年的影子：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常见的严苛规矩与管教中长大，每个周末只被允许看20分钟电视。为了让小时候的刘开心少看电视多看书，父母告诉她“电视只在周末演”，直到小学四五年级她才得知电视原来可以随时看。

刘开心在书里记录下小动物带来的美好：自己的小狗Harper，邻居家收养的橘猫阿杜，小时候养的“灰色的白兔”刘豆包。她分享生命中永远记得的那天：夏日的午后，妈妈难得地允许她“翘掉”小提琴课。两人沿着海岸线漫步，平常不被允许吃零食的开心，从妈妈手里接过了那团云朵一样的棉花糖，味道甜甜的。“我牵住了妈妈的手指，也牵住了还是孩子的日子。”

她在书里放自己在住院期间写的脱口秀段子：“2022年4月23日。继修好了心内科病房的水龙头之后，我又修好了风湿免疫科病房的马桶水箱。默默溜出房间，深藏功与名——千万不能让大家知道我的隐藏技能，否则万一被留下来当水管工可怎么办。——那我恐怕也会成为KPI最高的水管工。不慌。”

许多人能从她的画作里感受到生命的气息。在陌生的城市看到几棵零散呆立着的树，刘开心就把它们画下来，“是社恐的树”。她还画了一棵高大的橙黄色的树，“我坐在路边，贩售五角钱一份的夕阳”。

书封是一片蓝色的汪洋，海面上伸出了一只手。这幅画曾在社交媒体平台令很多人深受触动。有网友把自己的手覆盖在画面中那只手上，拍成照片发到评论区，“不要怕，你看，我们会拉住你下沉的手”。

面对不了解罕见病患者的人，她选择走近大家，告诉大家“我们只是不一样”。“有人说，从我的生活中看到了力量。我想说，是你们从我身上看到了你们自己的力量，也是这些力量在鼓励着我。”刘开心在书的封底写道。

某次与父亲闲聊，刘开心说自己想试着写写作为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的经历：“我迄今的人生跟‘完满’绝无半点瓜葛，但细品之下，却也算得上绚烂了。”爸爸告诉她：“绚烂比圆满更重要。那些写给童稚、写给青春、写给暮年、写给死亡的，归根结底，是写给安慰。我们可以不完美，但不能放任自己的不完美而不去争取自己想要的、更好的生活。”

在文字和绘画之外，刘开心会在有力气的时候，编织手链、制作花丝镶嵌、用水彩与甲油胶画手镯。虽然自己不能吃，也为朋友们烹饪美食。她把生活分享到社交平台，和网友们讨论和疾病共处的日常，还举办了画展《待叙》。

今年的2月28日是第18个国际罕见病日，中文主题为“不止罕见”。刘开心曾经戏谑地和医生朋友在这一天互道“节日快乐”：“我对着屏幕傻笑。把‘国际罕见病日’当作节日的，恐怕也只有我们。我们是数目庞大的少数派。”

“自在”和“张扬”都是刘开心很喜欢的词。“因为无论健康或疾病，快乐或悲伤，都没有办法阻止我们成为自在张扬的生命。是的，不抱怨不焦虑，勇敢去面对一切未知和困难。生活本就泥沙俱下，不被掩埋，已经是最大的体面了。”